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Volume 1
Issue 2 第一卷第二期

Article 9

January 1929

孔夫子與孫先生：歐遊雜感之一

Xujing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陳序經(1929)。孔夫子與孫先生：歐遊雜感之一。《嶺南學報》，1(2)，146-161。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1/iss2/9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越娘背燈」的戲劇的時候，已差不多五六百年了。不意五六百年前的『背燈』的習俗，仍舊流行於民間。

『背燈』的意義總算有着落了，然而不能認爲滿意。現在尚有幾個疑問，希望讀者指教。

(一)越娘背燈戲劇久已失傳，無從知其內容，且甌歌裡所敘述的背燈情形，不知是否和宋元時候完全相同，除且甌歌之外，比他年代早的書籍中，不知還有記載背燈事情的麼？

(二)現在永嘉民間背燈的風俗，和石氏所敘述的完全相同麼？

(三)這種風俗是否僅限於永嘉一地，還是別處也有的？

(四)南戲和雜劇的名目，在『越娘背燈』上都有『鳳皇坡』三字，『鳳皇坡』，不必說是越中的地名了，然而究竟在何處呢？在永嘉麼？

孔夫子與孫先生

——歐遊雜感之一——

陳序經

八年前，星架坡育英學校校長陳種仙先生，叫我用膠水畫張孔子像：像的上面題「至聖孔子肖像」，下面是署我自己名字。畫好掛於該校禮堂的中間。民國十三年，我赴叻省親，到育英時，還見孔子肖像照舊掛着。這次遊歐，道經星島，育英當局，要我到校同各同學談

話，我見得從前所掛孔子像的位置，已換掛孫先生的像；孫先生的像
是印的，像的上面題有「總理遺像。」我自去秋返國，逗留十個月，所
見各處公共地方所掛的，惟有孫先生的像；育英雖然以從前孔子所居
的位置給與孫先生，但是孔子的像，仍移於掛孫先生的像傍邊。我離
育英後，坐車回寓，在繁盛的大馬路上，雖然是車馬如雲，行人若
織，然在我的印象中所感覺最深的，還是育英禮堂的壁上的孫先生和
孔子的像。

印象是深刻的留住，車子已不覺到寓。數位很久不相見的朋友
們，已在寓待着我。我們的談話中，我會說及這件事。有位對我說：
也許育英當局，見得你的畫法精美，不忍放下來。我說：你太恭維我
了，又有位說：孔子是在中國過去受人崇拜最多的人，孫先生是近來
受人崇拜最普遍的人；孫先生與孔夫子並肩而坐，那裡有什麼希奇，
因此，又有一位問道：然則孫先生居中，而孔子居傍，後者當作何想？
我說孔子必說：「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我因此曾聯想到我們的黨頤名人戴季陶先生，彷彿說過：前有孔
子，後有孫先生。我又記得在孫先生的著作裡頭，引過孔子好幾次，
並且給孔子以相當的位置和信仰。我更聯想到十餘年前，我們的入校
的洗禮儀式是：對着至聖鞠躬三次。我們的誓願是：「初開蒙，拜聖
公，四書熟，五經通。」而我們的頌贊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
之在前，忽然在後。」現在的學生們，在週會的時候，是對着孫先生
的遺像行三鞠躬禮，而所讀的是：「余致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
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
徹。……」

這些的記憶，和好多的感想，使我注意到孫先生和孔夫子的同處。

過了數天，星洲日報載了雪蘭莪國民黨全體黨員，致電中央反對祀孔。其電如下：

”南京中央日報，轉中央黨部各省，市黨部，省政府鈞鑒：孔子學問思想，不合現世潮流，夫人皆知；前經明令廢止祀孔，今忽令行紀念，前後命令，自相矛盾，大失中央威信。海外同胞，莫名其妙，甚為譁然，如果實行祀孔，將置總理三民主義於何地？懇即明令取銷，以慰僑望。”

因此我又聯想到孫先生在民權第五講裡曾說：

簡單的說，民權便是人民管理政治。詳細推究起來，從前的政治，是誰人管理呢？中國有兩句古語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說：「庶人不議」（按這話見論語）可見從前的政權，完全在皇帝掌握之中，不關人民的事。今日我們主張民權，是要把政權放在人民掌握之中。

我又記得十九年前，我們瓊島陳氏宗祠裡所設的，以及我們每年八月廿七所跪拜的至聖先師的牌，現在好像已破爲薪，化爲灰。我們文昌的聖殿，在滿清時，何等莊嚴！出身寒微，家非士林，像我這樣人，雖然屢過其門，然因每聽一般長者戒曰：小孩子切莫沾污聖地；但是自革命在武昌成功後，聖殿的廊邊庭前，日見荒蕪！再看國內十年來的復古運動，孔教宣傳，與政治上的洪憲復辟，寡頭趨向，大都相爲形影。所以吳又陵先生在他的家族制度爲專制主義之根據論裡說：

”是故爲共和國之國民，而不學無術，不求智識於世界，而甘爲孔

氏一家之孝子順孫，挾其遊獵怒特蠭悍之氣，不辨是非，囿於風俗習慣釀成之道德，奮螳臂以與世界共和國不可背畔之原則相抗拒，斯亦徒爲蚍蜉蟻子之不自量而已矣。」

這些的記憶和感想，使我注意到孫先生和孔夫子的異處。

在環境上，孔子所處的是：王政不行，諸侯跋扈的時代。他的理想政治是：堯舜禹湯文武之治。所以他說：「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其對於舜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其對禹曰：「禹吾無間然矣。」又說：「巍巍乎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他的弟子顏淵問爲邦，他的回答是：「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又曰：「周盛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孫先生所處環境呢？是內政不修，外患日迫。其言得最透切的是，光緒十八年（1894）興中會的宣言。文云：

中國積弱至今極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智，鮮能遠慮。……乃以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然賄賂；官府則刮民剝地，暴過虎狼。……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鄰，久涎我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多，蠶食鯨吞，已見效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

『中國既到這麼弱，有什麼法子來補救呢？在他上李鴻章的書裡告訴我們：「幼嘗游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輿地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他以為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砲利，壘聳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所以我國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彷行西法，以籌自

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礮之是務，是舍本而求末也！」從這段話來看，我們覺得孫先生雖不贊成當一般專門注力於堅船利礮，然他的信仰西法，是很顯明的。在民權第五講裡，孫先生說：

“庚子年的義和團，是中國人的最後自信思想，和最後自信能力去同歐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於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人便知道從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夠和外國的洋鎗大礮相抵抗，便明白歐美新文明的確比中國的舊文明好得多。……所以從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國強盛，要中國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大種恥辱，事事便非倣效外國不可。”

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孫先生在嶺南學生歡迎會的演講裡曾誠懇的勸「嶺南學生要立國家的大志，學美國從前革命時候的人一樣，大家同心協力去奮鬥。……必須利用美國的學問，把中國化成美國。」民權第六講裡說：「中國幾千年以來，都是獨立國家，從前政治發達，向來沒有假借外國的材料，向來無可完全倣效，歐美近來的文化，才比中國進步；我們羨慕他們的新文明，才主張革命。」

從上面所舉出幾個例子，我們知道孔子是主張復古。孫先生是主張仿西。他們不同的原因也許是環境的不同所使然。但是他們的不同似非全部的，而是部分的；似非嚴格的，而是普通的；似非主要的，而是附庸的；似非根本的，而是形式的。要對於這一點有充分的了解，我們最好是看下面所舉的例子：

“照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看，實在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其餘那些皇帝，都是不能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所以中國几千年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

文武能夠負政治責任，上無愧於天，下無怍於民。他們所以能够達到這種目的，令我們在幾千年之後，都來歌功頌德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有兩種特別的長處：第一種長處，是他們的本領很好，能夠做成一個良政府，爲人民謀幸福。第二種長處，是他們的道德很好；所謂愛民愛物，視民如傷，愛民若子；有這種仁慈的好道德，因爲他們有這兩種長處，所以對於政治能够完全負責，完全達到目的。”（民權第五講）

消極方面，孫先生既無反對孔子所歌頌的堯舜禹湯文武的政治，積極方面，孫先生告訴我們「革命」二字，是創自孔子。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合乎民權的思想，而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在孫先生的手中，又得了一個新解釋。孫先生在民權主義第一講裡說：

“依我看來，中國進化，比較歐美還要在先。民權的議論，在幾千年前，就老早有了；不過當時只是見之於言論，沒有形於事實。”

其實孫先生在上段話之前一段，曾告訴我們：

“二千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稱堯舜，就是爲堯舜不是家天下，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君權，實際上因是行民權。所以孔子總是崇拜他們。

我們當然不要忘記在同段中，孫先生曾說「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沒有實行過民權，就是中國十三年來，也沒有實行民權。」我們也不要忘記，孫先生說過：「中國此刻正是改革時代，我們對於政治主張民權，這種民權，是由歐美傳進來的。」也許是孫先生以爲過去的中國的民權思想，與歐美的民權思想是有分別的；所謂堯舜實際上行民

權，與他理想裡的實際民權是不同。不過我們所特別注意的點是：孫先生並不反對孔子所贊頌的堯舜禹湯文武之治。

“歐美的民權思想沒有傳進中國以前，中國人最希望的就是堯舜禹湯文武，以爲有了堯舜禹湯文武那些皇帝，人民便可以得安樂，便可以享幸福，這就是中國人向來對於政府的態度。近來經過了革命以後，人民得了民權思想，對於堯舜禹湯文武那些皇帝，便不滿意，以爲他們是專制皇帝，雖美不足，由此便知民權發達以後，人民便有反抗政府的態度；無論如何良善，皆不滿意；如果持這種態度，長此以往，不想法來改變，政治上是很難望進步的。”（民權主義第五講）

補救人民對於堯舜禹湯文武的誤解，和改變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的最良善方法，是「權」與「能」的分別。而權能分別的道理，是和他對於人類分別的道理相連帶。人類，據孫先生的意，應有三種：第一種是先知先覺；第二種是後知後覺；第三種是不知不覺。照政治的運動詞來說：前者爲發明家，中者爲宣傳家，後者爲實行家。我想在孔子談論裡，這種人類分別的思想，是隨處可指出的：比方孔子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又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又如：「上知與下愚不移。」

原來人類的天然差別的學說，在政治上，每爲人治主義的根據。柏拉圖分人類爲三種，與在其共和國裡的人治主義的關係，是最顯明的。在孔子的思想裡是：「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又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所以季康子問政，他的回答是：「政者，正也。子師

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理想中的執政者既是聖賢上知，所以得了聖賢上知，天下便可以治，其結果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為一般百姓，本是無知，強使之知，徒損無益。

孫先生也說：

「我們要知道民權不是天生的，是人造的，我們應該造成民權，交到人民，不要等人民來爭，才交到他們。」

是誰要負造成民權的責任？自然是先知先覺的人，所以他又說：

「因為中國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就是再過幾千年，恐怕全體人民，還不曉得要爭民權，所以自命爲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的人，……要預先來代人民打算，把全國的權交到人民。」

這種政治，本來是德能政治，人治主義，也就孫先生所謂堯舜禹湯文武所以能得後人崇尊敬仰的愛民如子的政策。我想，辛亥約法之制定，及過去的護法運動，雖表現孫先生的法治的主張，不過這種法治的希望，終未見諸成效。其實十餘年來的政治經驗，使孫先生相信法治之不適於現在的中國，所以在他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的自序裡說：

「辛亥之役，汲汲於制定臨時約法，以爲可以奠民國之基礎，而不知適得其反！論者見臨時約法施行之後，不能有益於民國，甚至並臨時約法之本身效力，亦已消失無餘，則紛紛焉議臨時約法之未善，且斤斤焉從事於憲法之制定，以爲藉此可以救臨時約法之窮；曾不知癥結所在，非由於臨時約法之未善，乃由於未經軍政訓政兩時期，而遂入於憲政。試觀元年臨時約法頒布以後，反革命之勢力，不惟不因消滅，反得憑藉之以肆其

惡，終且取臨時約法而毀之；而大多人民對於臨時約法，初未會計及其於本身利害何若：聞有毀法者不加怒，聞有護法者亦不加喜；可知未經軍政訓政兩時期，臨時約法，決不能發生效力。夫元年以後所恃以維持民國者惟有臨時約法，而臨時約法之無效力如此，則紀綱蕩然，禍亂相尋，又何足怪？

政治上的向後轉，和向西走的差異，是形式的，而非根本。然我們若放廣研究的範圍，而從文化的立腳點上看，則孫先生與孔子，很有不同處；而其最大的同處，照我看來：是一則主張吾道一以貫之，一則主張一種折衷辦法。吾道一以貫之是孔子對曾子所說的話。孔子雖不說明什麼是道，子貢也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但據曾子對門人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子貢問他道：「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他說：「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又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從上面所舉出幾個例，及論語中各處的表現，道是包含仁義禮智信忠恕孝敬溫良恭儉謙讓各種德性。這種的道，是放諸四海而皆準，施諸萬世而不朽。所以子張問行，他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而這種道的重要處，可於他的「朝聞道，夕死可矣」中見之。

其實孔子的道，是一種精神生活，而非物質的道。比方：君子是得乎道的人，所以他說：「君子不器。」又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又如：「士志於道，而惡衣惡食未足以議也。」他的弟子中德行最好的首稱顏回，他又以為顏回是賢，故曰：「賢哉回也。」然其所以稱贊的原因是：「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他又

稱禹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他又說：「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上面不過從個人方面來說，其在家庭方面，他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其在政治國家方面，我們且看下面一段談話：

子貢問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之，於此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此外如」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樊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其最顯明的是：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不外是由這種道推衍而來。而中國數千年來的文化，差不多是這種道的特徵。道是處處都可以行的，而且是應當處處都行的；道是時時可以行的，而且是時時都應當行的。能得乎道，死也無遺恨。其實，若能「朝聞道，則夕死可矣。」

在孫先生的著作裡，我們隨處都可以見出他對於物質生活的注意。三十餘年前，在他所上李鴻章的書裡，所謂：「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四事，是偏重在物質方面。在同盟會的宣言的四綱，已注意到民生問題。建國方略分爲心理建設，物質建設，

社會建設，可知孫先生對於物質的生活，和非物質的生活相提並論。在他的國民政府建設大綱裡他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設大計畫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我們若把這段話和孔子對他弟子子貢所說的去食有信，其差異不言而知！

物質的生活，也許是物質的文化，是應當注重的。但是我們所要採納的是那一種物質的文化呢？孫先生的回答，就是：西方的物質文化。這種態度在上李鴻章的書裡已表現明白：在民權五講裡我們見得。

“外國的東西到底可不可以學呢？比方用武器講，到底是外國的機關鎗利害呢？還是中國的弓刀利害呢？這二種東西，沒有比較，一定是外國的機關鎗要利害得多；不但是外國武器要比中國利害，就是其他各種東西，外國都比中國進步得多，就物質方面的科學講，外國駕乎中國，那是不可諱言的。”所以，

“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學歐美。……因歐美關於管理物的一切道理，已經老早想通了；至於那些根本辦法，他們也老早解決了。所以歐美的物質文明，我們可以完全倣效，可以盲從搬進中國來，也可以行得通。”

文化是有物質和非物質之分，而且分得很清楚。這種思想和孔子的吾道一以貫之，而輕視和反對物質生活的見解的不同，是很顯明的。這處的向西走的孫先生，與向後轉的孔子，相去很遠。孔子是事事要效古的。堯舜禹湯文武的政治固是很好，夏時，殷輅，周冕也是很好的。好古就所以致知，所以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

之者也。他又自傳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實，在夢裡他也希望時時見周公。所以我們說：從文化的立腳點去看，孫先生的仿西和孔子的復古是有好多不同處。

歐洲的物質文明可以全盤搬過來。至於歐洲的政治制度，可師的處固多，然而歐洲政治制度本身上尚未進完善的地位，而有不少的毛病。就使歐洲政治沒有毛病而完善，我們也未必要學歐洲，「因為歐美有歐美的社會，我們有我們的社會，彼此人情風俗，各不相同。」（民權第五講）我們二千年前的堯舜禹湯文武，名義上雖是專制，實際上是行民權，他們的才能德義，他們的責任心，他們的愛民心在政治上所發生的效力是很大，而他們所以在百世以後，仍得人們的尊崇敬仰，也是在此。

因此孫先生在政治上的見解，就是：西洋人的好處而適合於吾國情形的，我們可以效仿；中國過去的政治制度，（北方過去的考試制度據孫先生說是一箇很好的制度，參看五權憲法的演講）和過去所用以治人的方法，若是適合近世潮流所趨，而針對中國情形需要的，也可以保存，或變用。至於外國沒有鏡子可鑒，中國沒有前事可師，而為現情所需者，則要賴一般先知先覺的人去發明新法子。在申報最近之五十年他所著的中國之革命文中說：

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

我們且再讀下去：

「觀中國歷史之所示，則知中國之民族，有獨立之性質與能力。」

……蓋民族思想，實吾先民所遺留，初無待於外錄者也。」

余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

點。”

在民族主義第一講裡我們又看見：

“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人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

回觀中國之革命一文孫先生說：

中國古有唐虞之揖讓，湯武之革命。其垂為學說者，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聞詠一夫紂，未聞弑君’；有所謂‘民為貴，君為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無其制度，故以民立國之制，不可不取資於歐美。”

簡單來說，在政治上，——民權民族主義——孫先生是根據中國的固有思想，而取資於歐美的制度。我閱民生演講，而見其於吾國固有思想，無所因襲，而且反對孔子所謂「不患貧而患不均」。參看民生主義第二講，是因為民生裏的食衣住行諸問題，乃偏於物質文化之範圍，而物質文化，又為孔氏所輕視。孫先生和孔子在文化上的向後轉和向西走的異同可以想見。

誰也知道孫先生是政治家，孔子是道德家。孔子並非不想在政治上活動的人。他的弟子子禽告訴我們：「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他自己也說：「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也可。」雖夷他雖然看不起，而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然有了一次，他曾想到夷狄人的國做事。不過根本上，孔子始終以道德為依歸。故有些人問他為什麼不為政，他說：「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吾道一以貫之，就是以道德為正鵠，而應用到各方面，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類別固多，範圍固異，然其方法

則一。

照孫先生的意見，「一國之內，人民的一切幸福，都是以政治問題爲依歸。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政治；如果政治不良，在國家裡頭，無論甚麼問題，都不能解決。」（民權三講）但是孫先生的政治觀，並非道德的政治觀，也非把道德和政治分開來講，而是一種政德兼顧的政治觀，孫先生說：

“中國從前能夠達到很強盛的地位，不是一個原因做成的。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由於武力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孫先生舉出元朝的武力，雖凌駕歐亞，然朝代不久的原因，是因爲道德的缺點。武力，照孫先生的意見，不但不能久長，而且非根本的方法。這一點他於民國十三年冬過日本時所講的大亞細亞主義裡說得很明白：

‘專就最近幾百年的文化講，歐洲由物質文化極發達，我們東洋的這種文明不進步，從表面的觀察比較起來，歐洲自然好於亞洲。但從根本上解剖起來，歐洲近百年是什麼文化呢？是科學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這種文化應用到人類社會，只見物質文明，只有飛機炸彈，只有洋槍大砲，專是一種武力的文化。歐洲人近有專用這種武力的文化來壓迫我們亞洲，所以我們亞洲便不能進步，這種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用我們中國的古語說，就是行霸道，所以歐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

武力既不能久長，霸道的文化既非根本的立國要素，我們應當從

道德方面做工夫。但是我們所要求的是那一種道德呢；孫先生的回答是：中國固有的道德。什麼是中國固有的道德？孫先生的民族主義第六講是專說這問題的。他說：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

這種固有的舊道德，就是孔子的根本道德。所以專從道德方面來看，我們覺得孫先生與孔子是完全立於同情的戰線裡。我們再看看大亞細亞主義所講的：

「我們東洋向來輕視霸道文化。還有一種文化好過霸道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威。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我們中國的古語，就是：行王道。所以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自歐洲的物質文明發達，霸道大行之後，世界各國的道德，便天天退步，就是亞洲也有好幾個國家的道德，也是很退步，近來歐美學者，稍為留心東洋文化，也漸漸知道東洋的物質文明，雖然不如西方，但東洋的道德，便比西方高得多。」

不但是固有的舊道德要保存，就是孔子的道德原則所發生的制度，也許是他的道德的結晶品，如宗族一樣，若果用之以為單位，「改良當中的組織，再聯合成國族，比較外國用個人為單位，當然容

易聯絡得多」。(參看民族五講)因此大學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據孫先生說：「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參看民族主義第六講)

統括上面所有的話，我們得下面數條的指示：

- (1) 從文化的物質方面來看：孫先生主張全盤效法西方，而與孔子處於對峙的地位。
- (2) 從文化的道德方面來看：孫先生和孔子是處在同一戰線上。
- (3) 從文化的政治方面來看，孫先生以為孔子的思想，並非有背於現代思潮，不過有其思想，而無其制度，補救之方，在於取資歐美之制度。

這當然不過就個人感想所到，而言其大概。孫先生與孔子的異同豈止於此？而且上面所表現的是偏於二人的思想本身上。比方：孫先生與孔子的主義，是從小團體的宣傳，逐漸的得政治上的勢力幫助，再以政治的勢力，使其普遍；以及其他異同之點很多，而且很有研究的價值。末了我的最深的感想，就是回憶篇首我的朋友所說：孔子是中國過去受人崇拜最多的人，孫先生是現在受人崇拜最多的人。我想若孔子而為中國數千年來的文化代表，則孫先生可以說是近數十年來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代表。

十八年冬於柏林